

前言：道德生物增強的關鍵爭論

Introduction: Key Debates on Moral Bioenhancement

徐漢輝 范瑞平

Xu Hanhui and Ruiping Fan

道德生物增強 (Moral Bio-Enhancement, MBE) 是指通過生物醫學手段 (如藥物、基因編輯、神經調控等) 直接干預個體的生理或心理過程, 以提升其道德認知、情感和行為能力的實踐與理論探索。這一概念源於對“人類能否通過生物途徑超越自然道德局限”的哲學追問, 近年來隨著神經科學、遺傳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而引發劇烈爭議。

本期專題聚焦道德增強的生物技術路徑與哲學反思, 圍繞道德生物增強的可行性、倫理邊界及其對人類本質的挑戰展開深度探討。徐向東教授撰寫的第一篇主題論文從哲學與認知科學視角, 批判 MBE 的核心預設——“神經本質主義”, 並指出其理論困境。首先, MBE 是對人類道德本質的誤讀。道德不僅是神經活動的產物, 更是具身性 (身體與環境的互動)、嵌入性 (社會文化語境) 與生成性 (意義建構) 的綜合體現。例如, 共情與道

范瑞平,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哲學講座教授, 中國香港。

Ruiping Fan, Chair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ublic &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徐漢輝, 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青年研究員, 中國上海, 郵編: 200433。

Xu Hanhu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ics for Human Fu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外醫學哲學》XXIII:11 (2025年): 頁 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1-6.

© Copyright 2025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德判斷需依賴身體感知、社會經驗與理性反思的協同作用。其次，MBE 存在實踐悖論。它可能將道德簡化為神經機制的可控變數，忽視道德理解的動態性與情境性。例如，催產素可能增強群體內信任，但會加劇對外群體的偏見，暴露技術干預的片面性。再次，MBE 可能涉及治療與增強的混淆。MBE 試圖通過修復“道德缺陷”來實現增強，但道德能力的判定缺乏客觀標準（如“美德基因”是否存在），且可能侵犯個體自主性（如強制基因篩選）。

徐向東教授的觀點犀利、論證詳實，引人思考，特別有助於我們把這一爭論引向深入。支持 MBE 的人大概會強調，他們並不一定要接受基因或神經本質主義。他們只需主張：只要基因和神經機制是影響道德行為的“一個相關因素”，那麼適當的干預就可能對道德表現產生正向作用，這就可能使他們贊成至少某些道德生物增強方案。其合理性在於：只要它是“一個相關因素”，適當干預的合理性就不能全盤否定。他們常用的類比是：就像教育和社會制度能提升道德素養，神經或基因干預也可以作為“輔助手段”來改善人類道德能力。例如，他們會論證，提升腦前額葉皮層的自控力、調節催產素來增強共情，並不會否定文化和社會對道德的影響，而是為個體提供更好的生理基礎，使其更容易做出道德選擇。

的確，支持者常常強調，他們並不否認道德行為的社會和文化根基，但如果神經/基因調節有助於減少暴力、提升同理心和合作，他們認為就是值得探索的。如徐教授文中提到的，他們常常指出一些實證基礎：藥物、激素、腦刺激等手段已被證明能影響衝動、共情、攻擊性等道德相關的心理屬性，這些改變並非“決定”道德行為，但能“提高”某些道德能力的基礎。他們強調 MBE 不是替代社會道德教育，而是兩者可以並行，形成“互補增強”。例如，有些人天生共情能力較低，傳統教育難以奏效，生物增強可以作為補充。他們也反對將 MBE 塑造成“社會洗腦工程”，而是作為個人道德成長的一個選項。總之，支持 MBE 的

人主張：只要基因和神經機制是影響道德決策和行為的一個相關因素，某些道德生物增強方案就是有益且可行的，這並不會否認道德的具身性、嵌入性與生成性，而是道德成長的“組成部分”，與社會文化、教育共同起作用。

這就將我們引向 Jason T. Eberl 和 Matilda Ajibola 所提供的第二篇主題論文，該文系統梳理了道德增強的兩種路徑：傳統間接路徑（如亞里士多德或儒家式美德教育、社會制度設計）與直接生物技術路徑（藥物、神經刺激、基因編輯）。其核心論點如下：第一，生物技術的局限性。直接干預可能削弱道德行為的自主性、真實性與能动性。例如，通過藥物或基因編輯“製造”道德行為，可能使個體淪為“技術傀儡”，喪失道德選擇的內在價值。第二，傳統路徑的不可替代性。亞里士多德式美德倫理強調道德習慣的養成需通過反復實踐與社會互動，如家庭教養、宗教儀式等，這些過程塑造了道德主體的內在一致性（“德性”）。第三，審慎的開放性。若個體具備明確的道德意願（如克服意志薄弱），生物技術可作為輔助手段（如通過血清素調節增強同理心），但需警惕技術濫用與倫理風險（如公平性、長期穩定性）。

總體上，這種觀點強調傳統間接路徑與直接生物技術路徑應該互相配合、綜合發展。但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一是這兩者的側重十分不同，如何進行配合？第二個問題是，應該如何吸取具體文化倫理資源，如儒家文化倫理資源，研究這兩條路徑的協同與文化適應？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傳統間接路徑側重通過教育、榜樣、家庭、社會制度等社會文化機制，培養個體的德性、判斷力和自律。其目標在於“自我修養”和“習慣養成”，強調長期的、內化的道德成長。而生物技術直接路徑則通過藥物、基因編輯、腦刺激等手段，直接干預神經生理基礎，提升如同理心、自控力、利他行為等道德相關能力，強調“底層能力提升”。後者可能見效快，但不涉及個人自覺與意義建構。因此，單靠生物增強，可能提升某些

能力，卻難以內化為穩定的道德人格，甚至缺乏意義感和社會認可；而單靠傳統教育，則面對某些先天或環境導致的道德缺陷（如強迫症、暴力衝動），效果有限。因此需要“互補”：生物增強為德性習得和實踐提供生理基礎，德性教育為生物增強賦予目標、方向和意義。人們似乎已經提出了一些“配合”模式，如能力-習慣模式、階段性-嵌入模式、個體-社會協作模式等，但發展有限、論證不足，尚待進一步研究。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儒家倫理重視德性與禮儀，具有情感與理性並重的特徵，強調家庭與社會角色。近來已有不少原則性提議，如“以人為本、以德為先、技術為輔”，即以德性教育為主、科技為輔，技術介入需有倫理規範，重視家庭和禮儀，尊重主體自覺，等等。在社區層面，或許可以結合“鄉約”“家訓”傳統，評估和指導生物增強的社會實踐。但總體上，這些都還停留在原則探討階段，具體和深入的研究尚未開始。

圍繞上述兩篇文章，本期共收錄 18 篇評論文章。學者們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於傳統間接路徑與直接生物技術路徑應該如何進行配合的問題，多數學者持有一種“傳統路徑為主，技術路徑為輔”的觀點，即認為直接的生物技術路徑僅應作為輔助和補充工具，針對特殊情況或特定人群使用。如趙文清提到，生物技術（如針對男性暴力的干預）應作為“補充工具”，用於幫助個體實現其已有的道德承諾（如減少家暴），而非替代傳統教育。Shane Ryan 指出生物技術可作為“克服意志薄弱”的臨時輔助手段，但需在傳統方法（如習慣養成）基礎上發揮作用。劉鑑銘和周境林同樣認為，生物技術僅能解決“一階欲望”與“二階欲望”的衝突（如克服偏見），但真正的道德成長需通過實踐和反思完成。同時，一些學者擔憂這種直接生物技術路徑可能帶來的倫理風險，如蔡昱和葉岸韜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指出，生物技術若繞過個體的自主選擇和內在掙扎（如通過藥物強制改變

行為)，將削弱道德的本質。因此，技術應用需以不破壞“真實努力”為前提。

對於應該如何吸取具體文化倫理資源的問題，不少學者強調儒家“內在修養”與“實踐優先”的特點。如鄧蕊指出，儒家強調“為仁由己”，即道德需通過自我反思和情境實踐實現，道德提升是“在生活實踐中完成”，技術外掛無法替代內在德性生成。么欣欣和王福玲認為，儒家“知行合一”和“反求諸己”的理念與生物技術的“外源性干預”存在根本衝突。葉金州在文章中提到，儒家應該會反對“技術規訓”，認為生物技術可能將道德簡化為“神經機制”，違背“心性本善”的預設。陳旻在文章中論述道，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認為每個人都有潛能成為道德善人，但該潛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反復自我省察，才可能真正培育出仁義之德。一個人要成為有德之人，必須經歷長期的培育。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埃伯爾、阿吉博拉：〈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85-113。
Eberl, Jason T. and Matilda Ajibola. 2025.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85-113.
- 徐向東：〈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7-34。Xu, Xiangdong. 2025.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 (2): 7-34.